

直面客观真实的金融史 推动金融业科学发展*

洪葭管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与世界金融史的回顾与分析,着重论述了五个问题:史料翔实,立论允足的金融史,有利于认识金融的真实世界;真实史料有助于对货币运动和对本国金融业现状的正确认识;历史上中国人的金融智慧值得汲取;通过真实史料更能看清在民国时期政治与金融政策上的严重问题;从真实的金融史角度看经济发展道路,金融业应充分发挥自身功能,担当社会责任。

关键词:金融史 金融危机 通货膨胀

JEL 分类号:E31 G01 N25

自笔者“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的观点发表后^①,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好评,几位同行还鼓励我对这一命题作深入研究和适当展开,让人们了解真实的金融世界,以利于现实金融问题的解决和推进《金融学》巨著的问世。为此不揣浅陋,对这一命题作进一步探索并草成此文,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史料翔实立论允当的金融史有利于认识金融的真实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金融形势的正确认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说当前世界金融形势复杂严峻,这是对美国2007~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以来金融现状最概括的分析和最深刻的判断。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延续五年左右的时间,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危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内生危机。在欧洲,发生了债务危机,已有五国政府的首相(总理)因穷于应付而先后辞职,欧、美两大经济体陷于金融困局,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极为缓慢,有的还处于负增长的边缘。这些困境的存在,使世界掀起了反思资本主义的热潮,找寻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弊端。有论者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不适当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主张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斯宾塞撰文指出,在金融市场上对贪婪和严重投机行为需要预防,但恰恰是“市场自身无法做到这一点”^②。

资本主义本有其致命弱点。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有过较快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都很突出,据统计,工业增长三到四倍,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以联邦德国为例,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0年时只有250亿美元,到1977年已增长到5000亿美元,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也几乎增加了近10倍^③。西

* 洪葭管,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顾问,研究员,2011年“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本文为《金融评论》主编特约稿。

① 参见“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访著名金融史学家洪葭管研究员”,《中国金融》,2011年,第15期。

② 迈克尔·斯宾塞:《理智战胜市场》,《财经》,2012年第3期。

③ 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欧共同体各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68年的2382亿美元增至1978年的7314亿美元,增加了三倍多。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固然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需要,而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以大量资金支持和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坚持向战败的德国索取赔款和向同盟者英、法等国讨还战时军事借款,完全是两种态度。美国固然在政治上获得“冷战”的胜利,而在金融上,则是耗费了大量的宝贵资金,伤了自己的元气。

美国国内有许多人怀念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称之为“难忘的八十年代”。这个8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转折点,是颇为关键的时期。如果我们按照“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的准则分析,这个80年代的转折,恰恰是美国华尔街大搞虚拟资本,进入所谓“非理性繁荣”时期。只要列举1973~2000年28年间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的变化就不难理解这变化背后的“玄机”。原来在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间道琼斯指数从1000点到700点,不仅没有涨,反而跌去近30%,记住这十年美国道琼斯股票指数未涨反跌的史实,就不难理解上海A股指数2245点的十年回归并非A股独有现象。此后发生变化,也就是华尔街大显身手,利用时机抢抬股票的结果,这一指数由1985年的1500点猛涨至2000年的近12000点,足足涨了8倍^①,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只涨了二倍多。运用和依靠这一“魔杖”,美国大规模发展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距十分明显。由此美国的一些百万富翁变为亿万富翁,国际资金市场上的游资数以十万亿美元计,似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亦因而解决了。但究其实质,爆发金融危机,破坏金融安全运行的隐患就潜伏在其深处。

刚刚跨入新世纪,美国就发生纳斯达克股市崩盘事件,指数由5100点跌至1300点,华尔街投行,尽管使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炒股本领,道琼斯指数在新世纪这十年中跌宕起伏,诡谲变幻,1907~1908年危机爆发后跌到9000点以下,资产大幅缩水,华尔街大公司亏损严重,有的倒闭,有的破产,有的被收购,连一向被誉为最佳银行的美国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的股票市值在危机最严重时也分别跌掉了96%、89%和57%^②。房地产次级债贷款危机元凶美国房地美、房地美两公司的股票最后以摘牌而告终。所以有美国有识之士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监管不到位,创新太过头,而是资产泡沫太严重。只有深切理解虚拟资本是制造泡沫资产的源泉,是酝酿金融危机最易爆炸的雷管,才会使我们有可能认识金融的真实世界。

客观地对未来世界金融趋势作一判断,当今世界货币总量已经超出货物总量的60倍,股票市值的规模超过全球GDP的总量,金融衍生产品占GDP比重达802%^③。在利用各种证券筹资比传统的银行贷款更容易的情况下,许多学者都有相同的看法,这便是对金融制度如不做有效的改造,金融不以资金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加社会财富,而依然热衷于玩弄虚拟资本,进行更大的投机、欺诈,那么,即使本轮危机暂时被抑平,但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在积聚和酝酿之中了。

二、真实史料有助于对货币运动和本国金融业现状的正确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声势浩大,在对于世界货币金融格局方面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形成两种平行市场;一种则认为还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统一的

① 指数分别见王缉思主编:《美国年鉴(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174页。

② 洪霞管:《中国需要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金融学巨著》,《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第105页。

③ 张志前编著:《货币泡沫——从金融危机到全球通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7页。

一个市场。在这一争辩未取得一致认识的背景下,新中国进入了60年金融的变迁,这60年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或四个历史时期进行研究:一是新民主主义金融的短暂实践时期,即1949~1957年的三年经济恢复和五年创新时期;二是1958~1976年高度集中统一体制为信贷过度投放开启大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金融工作的干扰与破坏时期;三是1979~2000年金融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有效途径尚待探索和完善,稳定货币金融大局仍为头等大事时期;四是进入新世纪,国际资本流动频繁,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宏观调控难度加大时期。金融领域这六十年的变迁,真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关系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但总的说来,金融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中,起了继往开来,稳定大局的作用。金融业是经营社会货币资本的特殊企业,对货币的稳定运行、货币流通受冲击、货币通过信贷的投放,货币供应总量变化等真实情况的了解,是衡量金融史著作是否具有魅力的一个主要方面。

中国本来可以沿着三年恢复、五年创业时期金融运行较有成效的做法继续稳步推进经济发展,但在“左”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开始了。所谓“大跃进”,实是违背经济规律,大肆扩大信贷,大量投放货币,造成1959~1961年间的严重通货膨胀。

在“大跃进”中,出现许多惊人做法和狂热口号。先是在“鼓干劲、破陈规”这一口号下,银行原来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弃置一旁,管理流动资金的原则被视作教条,在信贷资金实际使用上,奉行“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哪里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贷”等所谓革新措施。不讲效果,不讲监督,助长了工业企业盲目生产,商业企业盲目收购,造成大量物资积压和浪费。有的甚至把贷款应有的申请、调查、审核、批准等手续都省略了,由信贷员当场“拍板”决定便可。更有甚者,则是一接到企业借款电话,立刻由信贷员代办借款手续,干脆“送贷上门”。由于借款这样方便,许多企业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把银行贷款干脆作财政开支之用。1958~1961年间大量增加信贷投放,贷款额由277.5亿元骤增至803.5亿元,远远超过存款增加额。除自有资金垫补外,只有大肆增加货币发行。这四年间流通中货币由52.8亿元猛增至125.7亿元,后来中央文件就指出当时的严重情况是“货币发行过多,商品严重不足,部分物价上涨”,大家看了十分惊愕,因为已有10年不见通货膨胀了。尽管物价受控制,1961年零售物价指数仍猛升至16.2%。

中央看到问题严重,决定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并于1963年3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经过全国上下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努力,流通中货币额在1961年压缩至106.5亿元,1963年又压缩至89.9亿元,1964年更压缩至80亿元,贷款额亦逐年压缩到1964年的578.9亿元。上述各项均系降低余额,不是减少增幅。这样大规模调整之后,经济效益亦随之提高。就信贷资金使用效率而言,上海地方工业每百元工业产值占用流动资金由1961年的17.09元降低为1965年的12.01元,为1952年有完整统计以来产值资金率最优良的年份之一。

这些情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没有恢复之前,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则是讳莫如深,金融史著作如不把这些情况真实地写出来,也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

第三时期的一次通货膨胀,则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更值得深入研究。本来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经营时银行业务受到很大限制,现在经营范围一扩大,贷款种类增加,银行很快成为聚集资金和分配资金的重要渠道。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中,银行平均每年增加的存款只占国民收入的3.1%,1979~1982年上升到年均占8.2%,1983年更占9.3%。1983年6月实施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本来这一办法明文规定,国有企业自己应建立自有流动资金的补充制度,国家财政拨款的资金和企业自提流动资金之和,工业企业应不

低于70%，实际执行结果，则是财政不再拨给，企业也不愿补充，遂使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统一供应流动资金。这也就容易造成信贷增加过度，货币投放过多。由于其他改革不配套，城乡货币化程度加深，20世纪80年代即有1985年、1988~1989年两次通货膨胀，1994年还因“乱拆借、乱开发、乱集资”，发生两位数通货膨胀，1993和1994年通货膨胀率分别是14.9%和24.1%。经过大力压缩信贷，节约财政支出，还用大幅度提高利率（三年定期为年利率12.24%，有的年份还有财政出钱的保值补贴12%）的办法才把通货膨胀势头压制下去。

“资金是物资的货币表现”，这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话，还是应该记住。商品生产和劳务所生成的资金，本来是实实在在的，是“干货”；由虚拟资本股市疯涨产生的“市值”、楼市狂涨和其他投机手段产生的“产值”都不是实实在在的资金，而是虚拟的带有水分的泡沫，如果货币当局对此不加审察，而让资产泡沫不断加大，那就潜伏着最终产生危机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中资银行业存款迅猛增大，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以上海银行业存款余额为例，过去在20世纪70年代每年是十几亿元增长，80年代是几十亿元增长，90年代则是几百亿元增长，1996~1997年每年都是上千亿元增长（21世纪的头几年则是每年几千亿元增长）。从1949年到1991年的42年间全市存款由0.18亿元增至954亿元，还不到1000亿元，而1996年一年就增长1040亿元，变化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力治理通货膨胀后，货币供应量(M2)有明显下降，但到2003年后新一轮货币高速增长又复出现，2007~2008年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抑制通货膨胀与放松控制的过程，把2003年到2010年作为一个全过程，货币供应(M2)平均增速达到20.5%，M2与GDP的比率从2005年154%上升到2010年的181%^①。这既可说明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又复上升到5.4%，也点明信贷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金融史本应研究各种关系，对货币供应的这种变化的真实记叙，体现出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

三、历史上中国人的金融智慧值得记取

金融在世界上的产生、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漫长过程。在货币的发展方面，中国绚烂的货币文化发展之早，曾誉满全球，许多钱币还在邻国如越南、朝鲜等地流通。到了盛唐时期货币流通和信用可以说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纸币和信用工具方面，宋朝真宗时期四川成都16户富商发行称为“交子”的纸币，从1011年至1076年的65年间行使了22界（3年为一界），为时不能说不早，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批纸币，虽然未能演变成现代纸币（银行兑换券或国家纸币）。作为汇票的“飞钱”产生于8、9世纪，也未能最终形成市场经济需要的可流通的票据。但从全过程来看，已有其金融智慧的萌芽。

从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是一个巨变，在中国这个变化尤其具有复杂性，因为这个变化是在外国势力压迫下进行的。但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金融交易实是商品货物交易的自然延伸，就在上海1843年开埠不久，商业、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上海，1856年就有性质与“特别提款权”相同的“九八规元”的产生^②。

1. 上海于1856年以“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以后在商务上频繁使用，影响广泛

上海开埠后，外国银行和外国商行逐渐进入上海，当时市上货物交易用西班牙银元即本洋为媒介，后来本洋来源渐少，拟用墨西哥鹰洋代替未成，上海商界社会于1856年决定采用“九八规

^① 彭文生：《货币长周期的逻辑》，《财经》，2012年第5期。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25页。

元”这种虚银两,用作记账单位,授受使用的还是实银两即二七宝银和银元。以后上海一切商品交易,都要按银元银两折合兑换,从而产生了以“九八规元”来计算的“洋厘”。洋厘和银拆(银两的利率)在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成为上海钱庄手中运用的金融工具,每天的行市也均在钱庄业组织的钱业市场进行。这种以“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实际使用的是银两和银元,正如1969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采用的“特别提款权(SDR)”为记账单位,而实际使用的是美元、英镑、马克,只是前者比后者的产生年份早了整整一百年。

2. 防范风险和推进近代化经营,1932年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商会议决,所有行业停市三天,三天过后,到了2月1日商会又议决,停市无限期展延。上海银行界有识之士认为,停市越久,开业时越容易发生挤兑风潮,决定在有“联合准备”的条件下,各银行于2月4日复业。这个联合准备办法就是26家银行组成“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收存各银行缴存的财产。各银行缴存财产后,可按财产的市价七折作为担保,发行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三种信用工具,其中公单占40%,公库证占20%,抵押证占40%。规定的用途是:公单可用于向同业十足拆款,也可以代替现金流通;公库证可充发行准备或向发行银行作领用钞券的准备;抵押证得为同业借款的抵押品,亦可充作发行准备^①。有了这三种信用工具,联准会就可以利用这些增加了的流通筹码,办理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灵活同业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部分资产证券化。随后,钱庄亦大体上照此办法,天津、杭州等地银行亦均仿效这一办法成立类似组织。2月4日上海银行业首先复业,带动全市其他行业全部复业。实践证明,上海银行业这一办法,设想周密,适合国情,切实可行,故复业后取得银行对外应付裕如、金融全局稳定的良好效果。后来公单可开远期,并可贴现,这种公单印刷精良,交付便利,联准会又是公单的最后付款人,银行界和商界都乐于使用,成为上海银行界创新信用工具的成功尝试。上海银行业建立联合准备委员会这一做法,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组织起来的,这一制度的实施,明显地起了集中准备、调剂盈虚、实现同业互助、应付紧急状态、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是中国金融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功之举。

这一联合准备的核心内容,即是把各行的死资产变成活现金,用发行公单等办法来解决头寸紧缺问题,实质即是资产证券化的早期实践。当今美国金融危机,大搞资产证券化是贪婪投机,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手法,只不过美国大搞的结果是造成危机的爆发,而中国比美国人早半个世纪,试行“资产证券化”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高明措施,防范了风险的发生,取得了金融安全的良好效果。

3. “不高估汇价”,1935年币制改革获得成功

1935年币制改革是在绝对困难复杂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坚持“不高估汇价”的原则而获得成功的。1934年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商店、银行、钱庄大批倒闭,经济危机严重,市场局势紧迫。当时有人主张从平衡贸易入手,有人主张首先要改善经济结构的职能,有人认为扩充信用是解决之道,也有人认为已经造成通货紧缩因而主张仍可维持兑现,只需把银本位制进一步健全,包括减低银的成色等。政府财政当局采纳外国专家提出的建议和上海银行家提出的中肯意见,决定放弃银本位,切断白银与国外的联系,实行管理通货和有控制的纸币制度。新的币制是汇兑本位制,新币的对外价值“不能处于较高水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成为完全法偿的货币。白银完全收归国有,由中央银行掌管,在国外出售后充作法币的外汇储备。为稳定新币,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无限制买卖外汇^②。这里的核心是对外汇价“不能处于较高水平”,也就是币制改革后中央银行的牌价是每一元法币合英镑一先令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24页。

^② 洪霞管:《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5页。

两便士半,这是以五年来对英镑的平均汇率为基础计算出来的。但实际上照世界市场的银价计算,每一元应值一先令十便士半,现在定为一先令两便士半,相差八便士,也就是每一元钱的实值压低成六角五分。正由于主动的、具备一定条件的货币贬值,改革前那种通货紧缩、物价不正常下跌的现象就告消失,物价开始回升,城市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生产有了积极性。实施法币政策,也有利于抗战初期支持抗战军费支出的需要。

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实施黄金非货币化以来,多国采取的浮动汇率制,本质上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只不过当时中国尽管受英、美等国的压迫与牵制,但采取“不高估汇价”的原则,对症下药,取得了币制改革的成功,未始不是一些银行家发挥了金融智慧的结果。

4. 淞沪抗战爆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财政部应上海银行业的要求,下令停业两天,于15日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①,全文七条,主要内容是:(1)自8月16日起,银行钱庄各种活期存款,如需向原存银行钱庄支取者,每户只能照其存款余额,每星期提取5%,但每户每星期至多以提取法币150元为限;(2)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得通融提取,到期后,如不欲转定期者,须转作活期存款,但以原银行钱庄为限,并照第一条之规定办理;(3)定期存款未到期前,如存户商经银行钱庄同意,承做押款者每户至多以1000元为限,其在2000元以内的存款,得以对折作押;(4)工厂、公司、商店及机关之存款,如发付工资或军事有关须用法币者得另行商办;(5)同业或客户汇款,一律以法币支付之,凡以法币交付银行钱庄开立新户者,得随时照数支取法币,不加限制。

这一办法的直接目的是维护银行钱庄不致因客户无限制提存而无法应付,造成搁浅或倒闭。那时全国银行的存款总额已逾45亿元,上海一地约为20亿元,如让存户全部提取现钞,即使全国14亿元货币发行全部抵用,也应付不了上海一个地区。为安定战时金融,限制提存是必要的。这一办法的间接目的则是防止存户将其存款提取后,转存到在华外商银行,或者直接用来购买外汇。由于措施果断,办法一公布,惶惶然的人心也就安定下来;再由于当时处于民族危急关头,大家的抗日情绪高涨,同仇敌忾,都有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愿望,也就容易接受这一限制提存办法。

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和30年代初,上海成为中国金融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形成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出色的银行家,他们相当高的金融知识水平和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不仅改善了本单位的经营管理,增加了盈利和积累,而且推动和保持了整个金融业的发展。他们的经营策略和果断决策,都还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字公权),主管行务之外,还经常为《时事新报》写社论,他在货币和资金问题的认识上有一句名言:中国全部的银元有十五六亿元,但作为资金者不过五六亿元^②,这一理论性判断对于正确认识流通中的货币和把握宏观形势无疑有巨大意义。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李铭(字馥荪)常说:赚中国人的钱犹如赚自己家里人的钱,只有赚外国人的钱,才算有本领,才是有意义^③。他主持的这家银行在与外资企业、外汇业务经营上确实赚了不少的钱,先是与德国和日本人打交道,后来与美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家建立了密切关系,连上海电力公司日常收入的大量现金,也从原存汇丰银行改存到他的浙江实业银行了。在通货膨胀时期大家都把积累外汇作为生命钱,这家只有三家分行的银行在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外汇资金比那个有几十家分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要多。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字达銓)在考察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银行业的现状与趋势回国后即强调只有规模大、资力雄厚的大银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627页。

^②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行月刊》,1932年,第5卷,第3期。

^③ “座谈会记录”,《浙江实业银行档案》。

行才有前途,小银行难免有亏损倒闭的风险,后来“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实行部分联营,成立四行联营事务所,他就是这个营业所的主任办事员(即理事长)。金城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周作民,一心向往像日本的三菱、三井洋行一样,银行投资和放款给工矿企业,从上海到天津的津浦铁路线上沿途都可看到这家银行投资和放款企业烟囱在冒烟,他在国民政府将要实行币制改革的前夕给蒋介石写信、提建议,要求私营商业银行能与国家中央银行一起发行纸币^①。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在1935年币制改革前拟订的币改方案,其精神和大原则与后来政府实施的方案内容基本相似。至于从开办时资本额最小到最后成为最大私人资本银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陈光甫,以强调服务社会,不断创新业务闻名中外,但他对银行的稳定运行十分重视,他认为“金业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固是投机的集团,即如本埠地产何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呢?”^②这些银行家的一些看法,实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切结合国情和现状的科学论断。我们不能因为他们 是资产阶级而忽略他们这些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论,我们说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他们的这些不俗言论,正是我们尊重历史、借鉴历史时所值得吸取的。

四、史料真实更能看清民国时期政治与金融政策上的严重问题

民国时期蒋介石与金融问题,大概还很少或没有专著问世,当然这本专著应是很严谨,有很大科学性的学术著作,我个人著述中有两本书涉及到蒋介石与金融的,一本是《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一本是《中央银行史料》,前者2008年出版,43万字,后者2005年出版,130万字,讲的内容都是国民政府1927年4月成立到1949年下半年这一政权垮台,逃离大陆这期间的金融状况。金融史本应是研究金融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22年金融关系发展演变中最突出的人物,不是专门帮蒋介石管财政金融的宋子文、孔祥熙,而是蒋介石自己,至少从1935年到1949年即蒋介石执政的后半期,所有金融上的大事都是经过蒋介石决策、过问才决定下来的。可以说,强烈的集权欲望是蒋介石政治上独裁专制、金融上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

最典型的是1935年3月蒋介石急欲掌握金融大权,密谋攫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给孔祥熙的几封电报,当时他在贵州前堵尾追长征红军的路上,接到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电报“顷知庸之兄(孔祥熙字庸之)此举事先并未征取中、交两行张公权(张嘉璈字公权)之同意,恐将因此引起风潮……弟于此举事先亦未接头,致事后补救未知能有效否,盼尊处亦电知公权安慰其意”。蒋介石的复电极其干脆:“为救国家与社会计,今日财政惟有此一办法,舍此之外,皆是绝路,中、交两行如能顾全大局,不为少数人之自私,能为国家与社会稍一着想,而放弃其历来吸吮国脉命膏及反时代之传统政策,则应促成现在财政政策之实现,正所以救国而自救也”。同日晚上蒋介石从贵州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说:“国家社会皆濒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两行所断送”。这些均是绝妙的电文,似乎经济凋蔽,民不聊生,不是由于他的反动统治,而是张嘉璈办成功了中国银行,所以他欲攫取中国、交通两银行“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故要孔祥熙坚定“立场”并“务望转达林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汪(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孙(立法院院长孙科)、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居(司法院院长居正)、戴(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诸公坚决主张,贯彻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国”^③,由这两封电报可见蒋介石攫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的实施金融垄断意志之坚决、态度之强硬。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35页。

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版,第121页。

③ 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转引自洪霞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270页。

1939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成立，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身份兼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处按照规定，由“财政部授权它在战时对四银行可为便利之措施，并代行职权”。蒋介石自己兼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并不是挂一个空名，他多次主持理事会会议，重要措施均要经他批准，目的就是要加强四大银行对货币金融的垄断。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两个机构从成立起到结束止，都只有蒋介石一人担任过，别的人不能问津，他掌握军事与金融大权，便于他的专制独裁、集权政治的实施。

蒋介石在全面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曾于1937年7月9日由南京致电在上海的宋子文：“上海各银行现银与钞票，从速先移，运杭州与南京，准备向南昌、长沙集中，务望五日内运完”^①，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金融形势十分紧迫，处于战争即将全国范围展开之际，蒋介石要上海各大银行将白银和钞票内运，是从准备全面抗战的考虑出发的，比7月17日庐山谈话会还早十天。在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应对方针是“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银、钞内移，是想从物质财富上做好应战的准备，到7月28日宋子文呈报蒋介石，主要是从上海运出4.6亿多元钞票移存南昌、长沙、杭州三地。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的金融业是在极端艰苦环境中，通货膨胀逐渐严重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在这样战争时期，由于“美援”和美国军队在华各项费用的结算，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居然积累了8亿多近9亿元的外汇。到了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和宋子文策划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行黄金自由买卖，带来的是外汇流失，黄金锐减，通货膨胀加剧和社会更加不安定的后果。

宋子文1944年11月任行政院代院长，1945年5月任行政院长，为了犒赏他战时争取“美援”有功，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他空前信任，还让他担任新成立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长，似乎要把全国的经济工作都交付他去办理。这时宋子文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他想通过开放外汇市场使国际贸易正常开展，促成经济发展和民生安定；他还着眼于国际化，认为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和推进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实施。他组织一班智囊拟订了《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和《对外贸易暂行办法》，还在前者的“附则”（第二十九条）中规定“黄金得自由买卖，中央银行并得察酌市面情形，随时买卖之”，也就轻而易举地宣布开放黄金市场和中央银行有权在市场上抛售黄金。同时调整法币对外汇率，由战时固定在20元法币合1美元改为2020元法币合1美元，还采取稳定措施，由政府拨出5亿美元为法币发行准备金，另由中央银行在现行外汇中划出一定数量作为基金，以备随时平准市场之用。这个方案及有关措施经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6年2月25日开会通过。此时距抗战结束已半年多，但国防最高委员会还存在，主要也是便于蒋介石实施专制独裁统治。为保密起见，行政院长宋子文临时在会上提出这一方案，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当然容易通过了。

这一开放外汇市场方案的实施，意味着合法的进口需要和私人需要可径向中央银行及指定银行申请外汇。方案中把进口商品分为三类：(1)自由进口类，指工业及民生需要物品；(2)许可进口类，指烟草、火油、汽油、毛织品、丝织品等；(3)禁止进口类，指若干奢侈品。方案中还专门成立输入设计临时委员会，经济部部长任副主任委员，财政、交通、军政、粮食各部部长和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为委员。一方面，虽然汇率由20元调整至2020元，但由于通货膨胀势头未获抑制，国内物价上升趋势速度未减，外汇外币黑市买卖仍是投机者热衷交易的对象；另一方面，出口业务则一时不容易恢复，以出口创汇抵消大量进口的计划也归于落空。这些因素决定由国外输入商品仍有厚利可得，

^① 参见台北国史馆典藏《蒋介石总统档案》档号080109第008卷，财政7“币制”，卓遵宏《抗战初沪市金融的维护》，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

因此申请进口第二类商品者极为踊跃,遂有中央信托局、孚中公司、扬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等特权单位优先被批准进口美国商品的丑闻。当然进口外国商品特别是美国商品赚钱的企业、商号、个人何啻这几家,中外商人比比皆是。结果从开放之日即1946年3月4日上午10时起至11月17日止的8个半月里,中央银行因进口货物售出的外汇及政府其他用途结汇计38155.24万美元、1676.16万英镑,2432.55万港元。后两者如折合为美元,则三者共计4.55亿美元。同期出口商品只有5000余万美元,收支相抵,逆差达4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庞大的财富,中央银行可运用的外汇资金一下子就减少了60%^①。

反映历史真实的魅力就在于掌握第一手资料。人们总以为开放外汇市场,全是宋子文在策划,料不到这件空前大事,也是蒋介石自己的想法。蒋介石在1945年4月5日致电在美国的宋美龄并转孔祥熙,要他们与即将启程来美的宋子文共同商量开放大事,如何进行为宜^②。蒋介石抓紧督促,宋子文在重庆的班子迅速拟出方案,即上述的《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除了规定外汇管理的各项措施办法外,还在第二十九条(附则)规定“黄金得自由买卖,中央并得察酌市面情形,随时买卖之”。这也就是宣布开放黄金市场,中央银行有权在市场上抛售黄金。这样,在1946年3月起几个月时间里在消耗外汇4亿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明配暗售黄金达333.4万两^③。所以当黄金潮风波骤高时,查账的监察委员函询蒋介石,中央银行是否请示过他,蒋回电十分干脆,“丑皓电悉。查买卖黄金,系中央银行日常业务,本无须请示也”^④。

在实施金圆券币制改革时,蒋介石当局又勒令人民缴兑黄金,据中央银行向其报告,全国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其中上海一地110.3万两^⑤。蒋介石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当面指示,要他把上海中央银行库存作为金圆券发行准备的黄金运到台北库房^⑥。从现有资料看,运金到台湾谁也没有向他提过建议,完全是蒋介石自己决定的,因为那时是1948年11月上中旬之间,蒋介石表面上要军队在大陆前线为他卖命,要文官们替他料理各项政务,谁也不会大胆冒失向他提出运金到台湾的建议。由于黄金是金圆券的发行准备,黄金也是中央银行保藏在库房里,按职责分工理应由中央银行发行局具体办理。当时巨额金银是由上海中央银行从外滩九江路边门运走,从卡车驳运至十六铺码头,由中央银行派员押运,运载的船只第一批是十二月一日用“海星号”装载,美朋号军舰随行卫护,共装774件,共计黄金2004459506市两(即二百万零四千余两),十二月五日就运到台北。1949年1月2日又运走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市两运至台北(二批共257万余两)。1949年5月17日上海解放前夕又运走19.2万两。这三笔合计276万余两。洪霞管编著的《中央银行史料》用较多篇幅详细辑录了这些第一手史料。最近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去台北“国史馆”查阅蒋介石档案时见到的也就是这三笔^⑦。

过去一些报告文学、传记乃至电视剧多是说蒋介石在临近上海解放前夕才把这些黄金运走,其实蒋介石要把巨额黄金运到台湾的决定,早在1948年11月10日就面谕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去执行了。俞鸿钧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怎敢把如此紧迫任务任意怠慢。这么巨大数量黄金只花二十天时间于12月1日就运出200万两最大的一批,隔了一个月又运走第二批57万两,第三批19万两是在国民政府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威迫下于1949年5月16日从中央银行提走,由登陆艇

① 洪霞管:《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499页。

② 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③ 洪霞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6页。

④ 洪霞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⑤ 洪霞管:《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4页。

⑥ 洪霞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页。

⑦ 上海档案馆:《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17页。

运到台湾已是6月5日了。2009年大陆一家出版社把一本写黄金运台的书标作《黄金秘档》，其实这些档案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早已开放供人阅摘，洪葭管编著的《中央银行史料》有专门一章辑集此事有关资料，于2005年公开出版，《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也有一小节专讲此事，故该出版社称其“秘档”，何秘之有？！该书内容中把运台黄金笔数任意增加，把数额随之扩大。而大陆一些报刊、影视节目对其失实之处照样热烈宣传，乃至吹捧，颇有“皇帝新衣”之势，这对金融史贵在真实来说，实在太具讽刺意味了。这些黄金运台，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垮台、国家垄断资本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前夕所作的一次垂死挣扎。二百多万两黄金有80万两黄金作为台湾币制改革的基金^①。所以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说：“政府在搬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的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②。

五、从真实的金融史角度看金融业应充分发挥自身功能担当社会责任

从上述四方面金融史的陈述，可以折射出现实经济的发展应采取什么方针，走怎样的发展道路。我们应当坚持经济与金融的辩证关系：金融虽受制于经济，但又能对经济的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金融业亦已在国际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有了相当大的外汇储备，但也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位居世界前列，资产价格泡沫明显存在，增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在这样大背景下，研究金融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稳定货币信用大局，正确治理通货膨胀，造福全体人民的小康生活，是有很大大意义的。当现实经济生活、现实金融领域矛盾问题较多处于困境时，人们更容易想到历史上中外金融领域有过哪些好的做法、经验可以借鉴，有哪些金融智慧值得深入挖掘使之重放光彩，有哪些惨痛教训必须认真吸取，有哪些措施能维护金融安全以防患于未然。这大概就是“以史为鉴”、“以往鉴来”乃至“以往开来”的精神的具体运用罢。

有的学者遇到问题复杂就提出只有改革才能解决困难、解决问题，一遇到对外经济交往中的矛盾就提出只有开放才能消除矛盾。这种不分析问题的轻重缓急，不分析矛盾的由来，不瞻前顾后，不结合国情，不问时间条件，笼统地认为只要改革开放就能解决问题的看法，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他们的论点其实就是一条：市场经济万能论。他们不仔细想一想，标榜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什么会发生1929年的大萧条？为什么会发生2007~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为什么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什么贫富悬殊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从金融史角度看，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华尔街投行们和大亨们玩弄虚拟资本太过份了，所谓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产生，资产证券化无限扩大，终于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发生，又进一步诱发美国金融体系内危机——金融危机。投行们不断制造泡沫，把本来没有财富为后盾的高出实物价值几倍乃至十几倍的资金列入账面资产，一旦资产泡沫破裂，资产大幅缩水，受害者大批亏损，只能破产、倒闭，谁还会热衷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受害居民也不得不减少消费，乃至被迫限制消费。

正因为看清了世界金融诡谲的一面，温家宝总理在第四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

^① 《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 7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转引自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629、631、632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

中卿著文《金融业的使命与责任》^①提出“金融业必须面向实体经济,金融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必须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三个必须,尤使人深思。

从真实的金融史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初几年信贷资金使用效率高、促进工业生产发展、效益提高、企业夸赞的信贷员制度,值得把其好的经验总结推广。我们之所以认为那时信贷员发挥作用,正由于信贷员制度是合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良好金融行为和出色的“游戏规则”,由银行通过信贷员的调查研究对大、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具体做法,是合乎市场经济的行为,因为银行把钱贷给企业,作为债权人是应该也必须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产供销状况乃至经济管理状况有全面了解,从而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建议。这是天经地义的,是促进生产发展效益提高的必要措施。

当然信贷员不是个人在行动,而是代表掌握征信和研究两大系统的银行在行动,通过对各企业、各行业系统的全面了解,对市场变化有正确的估计,因此银行的集聚资金和分配资金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又能做到引导资金流向,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调节社会总需求,从而担负起对国计民生有利的社会责任,这无疑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机制。金融业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它本应担负起稳定币值,慎对虚拟资本,严控资产泡沫,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神圣职责。在金融的全力支持下,实体经济生产发展了,效益提高了,效益与公平的矛盾减轻了或者消除了,人民生活逐渐富裕了,这时人们对金融史魅力在于客观真实、金融的精髓本应是帮助社会增加物质财富而不应是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真谛,也就更容易掌握和理解了。

参考文献:

- 何方(2010):《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
- 洪葭管(1990):《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
- 洪葭管(2005):《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
- 洪葭管(2008):《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中国金融出版社。
- 洪葭管(2010):《中国需要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金融学巨著》,《中国金融》,第19-20期。
- 彭文生(2012):《货币长周期的逻辑》,《财经》,第5期。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陈光甫先生言论集》。
- 上海市档案馆(2007):《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
- 上海市档案馆(2011):《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1辑),上海三联书店。
- 斯宾塞,迈克尔(2012):《理智战胜市场》,《财经》,第3期。
- 王缉思(2000):《美国年鉴(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汪荣祖、李敖(2004):《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魏革军(2011):“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访著名金融史学家洪葭管研究员”,《中国金融》,第15期。
- 吴景平(2008):《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
- 尹中卿(2012):《金融业的使命与责任》,《经济观察报》,1月16日。
- 张志前(2012):《货币泡沫——从金融危机到全球通胀》,中国经济出版社。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1989):《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60):《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1983):《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1991):《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1932):《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

(责任编辑:赵一新)

^① 载于《经济观察报》,2012年1月16日。